



清华老讲义

一堂教你格局、传你精髓的国学大师公开课

中国近三百年

学
家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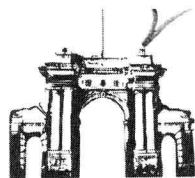
梁启超◎著

深刻影响梁思成、梁实秋、徐志摩、蔡锷的作品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清华老讲义

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

梁启超◎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梁启超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04-5076-2

I . ①中… II . ①梁… III .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IV . ① 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0410 号

上架建议: 社科文化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 者: 梁启超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张 海

特约编辑: 赵 辉

封面设计: 北京大象无形设计策划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63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076-2

定 价: 3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近者，欣悉梁任公先生遗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行将再版。遵责任编辑嘱，谨将旧日读书所记稍事删节，忝附骥尾，敬请指教。

(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学科，尤其是清代学术史研究，梁任公先生是公认的杰出奠基人。缅怀先生奠立藩篱的卓著业绩，当从《近世之学术》谈起。

1902年，先生发愿结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全书原拟作十六章，惜仅写至第六章隋唐佛学，便因故搁笔。两年后，方于1904年夏，续撰讨论清代学术之专章。稿成，即以《近世之学术》为题，刊布于《新民丛报》。文凡三节，第一节为永历、康熙间，第二节为乾嘉间，第三节为最近世。先生把清代学术置于中国古代学术之全过程，论证：“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之可以变为清初，清初之可以变为乾嘉，乾嘉之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巨且剧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近世之学术》第一节）全书立论，虽然对章太炎先生《馥书》有所借鉴，但是却以较之太炎先生略胜一筹的高屋建瓴之势，对二百数十年间学术演进的历史作了鸟瞰式的勾勒。轨迹彰明，脉络清

晰，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实在是一个创举。

《近世之学术》于清代学术基本特征，有如下总体把握，即：“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演绎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同上书第三节）对清初诸儒，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先生评价甚高，且以刘献廷与诸家并提，合称“五先生”。先生的结论是：“五先生者，皆时势所造之英雄，卓然成一家言。求诸前古，则以比周秦诸子，其殆庶几。后此，惟南宋永嘉一派（原注：陈止斋、叶水心、陈龙川一派），亦略肖焉。然以永嘉比五先生，则有其用而无其体者也。即所谓用者，亦有其部分而无其全者也。故吾欲推当时学派为秦汉以来二千年空前之组织，殆不为过。”（同上书第一节）

在彼时的梁任公先生看来，从清初诸儒到乾嘉学派，一代学术是在走下坡路。因此，先生对乾嘉学派评价，即有肯定，亦有惋惜，指出：“吾论近世学派，谓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而惜其仅用诸琐琐之考据。”至于太炎先生《馗书》所论乾隆间惠栋、戴震二家，任公先生既认为：“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但同时又对戴震颇多微辞，乃至委罪东原，宣称：“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心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同上书第二节）

晚清今文经学营垒，以兴戊戌狂飚而康、梁齐名。早年，任公先生曾在广州万木草堂从学于南海先生，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当时的日本，经历明治维新，锐意求治，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学术文化诸方面，皆一跃而成为亚洲一流强国。置身于此一相对开放的国度，任公先生得以广泛接触西方哲学、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深入探讨日本强盛的缘由。这不仅给了先生以政治主张的学理依据，而且亦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当任公先生结撰《近世之学术》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时，正是先生摆脱今文经学羁绊，逾越康南海先生的改制、保教说藩篱，成为进化论笃信者的关头。先生把进化论引进史学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学

史上，率先举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近世之学术》及其相关史学论著，正是“史界革命”之产物。由于从旧营中拔足，且找到了为今文经学所不可望其项背的思想武器，因而当先生回过头去俯视旧营垒的时候，其中利弊得失自然可一语中的。惟其如此，先生于晚清今文经学分野，方能揭出如下得中肯綮之高论：“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谓廖平先生——引者），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同上书第三节）

从《近世之学术》中可见，在梁任公先生就清代学术史研究开启门径之时，先生于一代学术的总体评价并不高。用先生的话来讲，就叫做：“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然而作为一个正在奋发向上的年轻学者和思想家，先生对中国思想界的前景则甚为乐观。篇末，先生满怀信心地写道：“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同上书第三节）

（二）

1920年，以《清代学术概论》的发表为标志，梁任公先生二度进入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就著述形式而言，《清代学术概论》同《近世之学术》一样，依然只是清代学术的一个鸟瞰式的提纲。然而仔细比较即可发现，二者之间虽有继承，有因袭，但却不是简单的复述。正如先生所自言：“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什一而已。”（《清代学术概论》卷首《自序》）综观全文，任公先生在其中不仅对昔日的某些结论做了必要修正，而且展示了对一代学术更深更广的思考，从而使这部论著成为先生晚年治清代学术史的纲领性

著作。

以下，拟就《清代学术概论》与《近世之学术》的不同处，做一扼要讨论。

首先，是关于清代学术史的分期。在《近世之学术》中，先生依时间先后为序，分一代学术为四期，即“第一期，顺康间；第二期，雍乾嘉间；第三期，道咸同间；第四期，光绪间”。对各时期的主要学术趋向，先生归纳为，一期程朱陆王问题，二期汉宋学问题，三期今古文问题，四期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近世之学术》第一节）这样的分期和归纳，先生似有未尽满意处，故而特意加了一个注脚：“上表不过勉分时代，其实各期衔接掺杂，有相互之关系，非能判若鸿沟，读者勿刻舟求之。”（同上）到写《清代学术概论》时，先生就没有再简单沿用呆板的时序分期法。当时先生正从事佛学研究，遂借用“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的观点，并使之同时序分期相结合，将一代学术做了新的四期划分。这就是“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清代学术概论》一）同样是四期划分，按时序分期虽无大谬，但它严格地说来只是简单的自然写实。而盛衰分期法，则试图通过对学术思潮演变轨迹的探寻，揭示一代学术发展的规律，因而是从本质上向历史实际的接近，是前进而不是背离。

其次，是对清代学术基本特征的归纳。如果说《近世之学术》还只是以考证作为清代主流学派的学风，那么《清代学术概论》则是把整个清代学术均视为考证学。该书开宗明义即云：“我国自秦以来，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同上）所以在论及考证学派的演变源流时，任公先生说：“此派远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同上书十九）在先生看来，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职志，采取绵密的考证形式而出现，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思潮。先生认为，清代学术的“复古”特征，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有一个层层递进的上溯趋势，一言以蔽之，就叫做“以复古为解放”。任公先生将这一趋势表述为：

“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同上书二）显然，这样一个归纳已经把《近世之学术》所论“古学复兴”，从简单表述引向了深入。因为它不惟充实了“古学复兴”的层次，而且还探讨了“复古”的目的。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估计出发，任公先生将“以复古为解放”作纽带，把清末民初的学术演进沟通起来，指出：“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同上）

再次，是对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的评价。一如前述，在《近世之学术》中，先生从总体上对清代学术的评价是不高的。然而事隔十六年之后，先前的看法则出现重大修正。当时，正值任公先生结束一年多的欧洲返国。访欧期间，先生对欧洲的文化，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化居以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将这一认识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对照，旧日的悲观消极为之一扫，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先生自始至终把清代学术同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较，对其历史价值进行了充分肯定。欣然指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其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端焉。”（同上书二）这也就是说，清代学术即是我国历史的“文艺复兴”，有清一代乃是我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关于这一点，任公先生在为《清代学术概论》撰写《自序》时，对旧著的一处改动，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先前著《近代之学术》，任公先生是把清代的二百余年称为“古学复兴时代”，而此时引述旧著，则不动声色地将“古学”二字改作“文艺”。先生写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同上书卷首《自序》）这样的改动和评价，同早先“思想最衰时代”的论断，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三)

以《清代学术概论》为起点，梁任公先生在其晚年，较为集中地对清代学术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其主要表现，首先就在于先生对戴震及其哲学的高度评价。

1923年10月，先生向学术界发出倡议，筹备召开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为此，先生撰《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一文。文中，先生对戴震及其哲学备加推崇，指出：“前清一朝学术的特色是考证学，戴东原是考证学一位大师。”又说：“戴东原的工作，在今后学术界留下最大价值者，实在左列两项。”即一：“他的研究法”，二：“他的情感哲学”。先生认为，由于这两方面的价值，所以戴震“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是足以同朱熹、王守仁“平分位置”的“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为了准备这次纪念会，先生赶写了《戴东原先生传》和《戴东原哲学》，会后，又撰成《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在这几篇文章中，梁任公先生对戴东原的生平学行、思想渊源及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先生的结论是：“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虽仅享中寿，未见其止，抑所就者固已震铎往祀，开拓来许矣。”（同上书《戴东原图书馆缘起》）

梁任公先生晚年，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奠立藩篱的又一重要努力，则是先生对整个十七世纪思潮的研究。重视清初实学思潮的探讨，这在任公先生数十年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可以说是独具个性的好传统，是足以构成先生的研究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先生所走过的路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程。早先，先生只是将清初思想作为一代学术发展的初期阶段去进行考察，肯定其历史地位。而到先生晚年，随着学识的积累，研究的深入，已然逾越王朝兴替的界限，扩展为对整个十七世纪思潮的研究。为此，先生于1924年专门撰文一篇，题为《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

人物》。文中，先生对上起 1624 年，下迄 1724 年，一百年间中国思想界的演进趋势及其代表人物加以论列。至于之所以要以明清之交为论究时限的缘由，先生指出：“若依政治的区别，是应该从 1644 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所以本讲所讲的黎明时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约和欧洲的十七世纪相当。”先生的结论是：“这一百年，是我们学术史最有价值的时代，除却第一期——孔孟生时，像是没有别个时代比得上它。”（《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册《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在任公先生晚年所进行的十七世纪思潮研究中，对颜李学派的表彰是一个影响久远的重要方面。清初大儒颜元曾经说过：“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学问》第二十）先生由衷地服膺这一主张，并据以对颜元、李塨做出极高的评价，指出：“颜、李不独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当时，正值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访华之后，杜威以及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风行一时。有鉴于此，任公先生认为，颜元、李塨的学说，同样可以与之媲美。先生就此说：“他们所说的话，我们读去实觉得履心切理，其中确有一部分说在三百年前，而和现在最时髦的学说相暗合。”任公先生把颜李学说同现代教育思潮相比较，对颜元、李塨的教育思想和主张进行了详尽的引证。先生呼吁：“我盼望我所引述的，能够格外引起教育家兴味，而且盼望这派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能够因我这篇格外普及，而且多数人努力实行。”（《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册《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后世教育学界对颜元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是可以告慰任公先生于九泉的。

1924 年前后，是梁任公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先生除连续发表上述论文外，还着手进行《清儒学案》的纂辑。1923 年 4 月，先生就此致函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先生，信中有云：“顷欲辑《清儒学案》，先成家数以问世，其第一家即戴东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十册《致菊公书》）翌年初，先生在高校授课

时又特地讲道：“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业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很可惋惜的是，天不遂人愿，任公先生结撰《清儒学案》的计划未及实现，病魔便将先生生命无情夺去。先生临终给学术界所留下的，仅为戴震、黄宗羲、顾炎武三家学案及《清儒学案年表》几百余页手稿。其后，徐世昌先生承任公先生未竟之志，网罗旧日词臣，历时十年，终成二百零八卷之巨帙。今日谈《清儒学案》掌故，其间之因缘抑或不当忽视。

（四）

为创辟清代学术史研究之门径，梁任公先生晚年所做的第三桩大事，便是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先生所撰写的授课讲义，即题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刊行，成为不朽的学术名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继《清代学术概论》之后，任公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又一部重要论著，也是先生晚年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研究成果的荟萃。在撰写《清代学术史概论》时，先生刚由政治斗争旋涡拔足，所以这部大纲式的论著难免还颇带些昨日政论家的气息。而此时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生已经是执教有年的著名教授，对学术问题的探讨，较之数年前更为冷静、缜密。因而作为一部学术专史的雏形，这部著作显然就比《清代学术概论》趋于成熟。它既保持了作者先前对清代学术史进行宏观研究的独具特色，同时又以专题、专人的深入研究，使宏观研究同局部的、具体的考察结合起来。两部书之间，一个是大纲，一个是专史，其间存在不可分割的递进、展开、深入关系，实为相辅相成的姊妹篇。惟其如此，先生于授课之始，即告诉听众：“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至于书名的确定，全书开宗明义即讲得很清

楚：“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反动与先驱》）

全书或依学术门类，或按治学好尚，凡作十六目，将三百年间重要学者及其业绩区分类聚。卷首一目，题为《反动与先驱》，先生谓之为“楔子”，亦即后世习用之“绪论”、“前言”，旨在说明“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学术，与历代王朝千变万化的政治格局，其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是吾国古代学术的一个鲜明特点。封建专制空前强化的有清一代，尤其如此。因之本书二三四目，任公先生以时代先后为序，对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展开专题论究。其后之五至十二目，皆为清初诸儒及其学术贡献之梳理。十三至十六目，则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为题，对一代学术界中人总结整理数千年学术之卓著业绩进行归纳。

综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无论是对清代学术主流的把握，还是对不同时期学术趋势的分析；无论是对清初诸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的研究，还是对先前所忽视的方以智、费密、唐甄、陈确、潘平格诸家的表彰，都显示出基于深厚研究积累之上的卓越识断。其中，尤以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的专题探讨，搜讨极勤，最见功力，从而成为任公先生晚年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1924年4月，当先生将这一部分书稿送请《东方杂志》率先发表时，曾就全篇所列二十个学术门类说过如下一段话：“每类首述清以前状况，中间举其成绩，末自述此后加工整理意见，搜集资料所费工夫真不少。我个人对于各门学术的意见，大概都发表在里头，或可以引起青年治学兴味。颇思在杂志上先发表，征求海内识者之批驳及补正，再泐为成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十册《致菊公书》）时至今日，八十余年过去，先生在其间所付出的辛

劳以及诸多指导性意见，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

梁任公先生晚年，困不惬于《清代学术概论》的简略，而久有改写的志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很令人惋惜，先生生命的最后数年，没有再继续往前开拓下去，而是把极有限的岁月转向先秦子学研究。严格地说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应当说还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因为任公先生在该书一开始便说得很清楚：“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又说：“要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同上四《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可是全书终卷，这个任务却只做了一大半，清中叶以后的学术史，仅有综论而无说明，更无详细解剖。尔后，先生为病魔深缠，直至1929年1月赍志辞世，始终未能再行涉足清代学术史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桩令人深以为憾的事情。倘若天假以年，使梁任公先生得以矢志以往，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为一，完成结撰《清代学术史》的夙愿，那么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巨大贡献，当是不可限量的。

（五）

从《近世之学术》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园圃中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发凡起例，辟启蹊，于学科的奠基和建设，建树了不朽的功绩。

有清一代，对当代学术发展源流进行局部梳理，从其中叶便已开始。嘉庆、道光间，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开风气于先，江藩继起，撰就《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和《国朝经师义目录》，皆为此一学术趋向之滥觞。随后，唐鉴不满藩扬汉抑宋的做法，一反其道，独以程朱学派为大宗，置经学、心学为异己，编成《国朝学案小识》，也堪称梳理有得者。不过，江、唐二家所著，虽然对我们了解清代前期学术界的状况不无参考价值，但是他们皆为门户之见所蔽，其中尤以唐鉴为甚，亦留下

诸多遗憾。因而，就学术史研究而言，他们的所得同任公先生相比，就未免逊色得多。任公先生的研究之所以远胜前人，其根本之点就在于，先生将进化论引入学术史研究领域，把清代学术发展视为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对它进行了宏观的历史研究。

梁任公先生的青年时代，当其跨入清代学术史研究门槛的时候，便以旧史家所不可企及的魄力和卓识，大胆地提出了历史的三大界说。即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不惟如此，而且在中国史学史上，梁任公先生还第一次从西方引进“历史哲学”的概念，先生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饮冰室文集》第三册《新史学》）梁任公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过程，也就是先生以其历史哲学为指导，去探索这一领域公理公例的过程。

从《近世之学术》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先生的全部清学研究表明，先生并没有满足于对清代学术演变源流的勾勒，也没有局限于对清代学者业绩的表彰。先生研究的卓越之处在于，试图去探索在清代历史上递相出现的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合而视为一个独立的思潮，进而找到这一思潮与其前后历史时期所出现思潮的联系。任公先生的研究所昭示给人们的，既不再是数千年旧史家对封建王朝文治的歌颂，也不再是从朱熹到唐鉴，历代学者对一己学派的表彰，而是一个历史时期学术盛衰的全貌。这样，梁任公先生便以其“史界革命”的实践，把清代学术史研究引向一个崭新的天地。

十分可贵的是，身为晚清学术界的一位代表性人物，梁任公先生却能以一个杰出史学家的理智，摆脱门户之见的羁绊，对自己亲历的学术史事进行冷静、缜密的研究。先生“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史料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卷首《自序》）先生曾经如此自述：“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

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同上书二十六）在中国学术史上，能如同梁任公先生一样，把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去进行解剖者，实在是不可多见的。正是这种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学风，使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开创精神久而不衰，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杰出奠基人。

学术研究，归根结蒂是要解决问题，追求真理，从而推进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维水准。然而，问题的解决，真理的把握，却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研究者付出长期的、一代接一代的艰辛劳动。因而，作为开拓者，评判他们功绩的依据，往往并不在于能否解决问题，历史给他们以肯定评价的理由，则是他们提出问题的识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在学术研究的创造性劳动中，具有同等重要价值。

梁任公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历史价值就绝不仅是因为先生触及并着手解决前人所未曾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而且更在于先生提出了深化研究必须解决的一系列基本课题。在梁任公先生所提出的研究课题中，既有对规律性认识的探讨，也有对局部问题的深入剖析。前者譬如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清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十七世纪思潮研究，清代学术的历史地位等等。后者譬如戴震及其哲学和颜李学派的评价，乾嘉学派、常州学派的形成，一代学者的文化典籍整理，晚清的西学传播等等。八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正是沿着梁任公先生开辟的路径往前走，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去解决先生和其他前辈大师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同时又在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中，不断发掘出新的研究课题来，从而把清代学术史研究推向深入。批判地继承梁任公先生所留下的学术文化遗产，完成先生所未竟的《清代学术史》编纂事业，这恐怕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位学术大师最好的纪念。

陈祖武 谨识

二〇一一年四月廿四日

目 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一 反动与先驱 001
-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011
- 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017
- 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024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 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039
——黄梨洲
附：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 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 052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舄明 万充宗
- 七 两畸儒 074
——王船山 朱舜水
- 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 085
——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 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097
——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 十 实践实用主义 106
——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昆绳 程绵庄 恽皋闻 戴子高
- 十一 科学之曙光 139
——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
- 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149
-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176
——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
- 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221
——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 十五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265
——史学 方志学 地理学及谱牒学
- 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325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 乐曲学